

一门关于灾害共生实践的学问*

——日本灾害社会学述评

蔡 麟

提 要 | 在过去的 60 余年里,日本关于灾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灾害社会学。在基本理念方面,它以集合行动论、社会信息论、组织论和地域社会论为基本视角,通过“脆弱性”和“复元·恢复力”的发现,实现了由“天灾论”到“人祸论”,再到“灾害共生论”的飞跃;在研究实践方面,它在灾时的生命和心理、灾后的生活重建和地域复兴等领域蓄积了丰硕成果,近年又把研究范围推进到防灾福利社区和公民社会建设、灾害应对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男女共同参与问题、受灾地调查研究方法等领域;在研究取向方面,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人类遭遇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渐成常态的今天,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启示意义自不待言。

关键词 | 灾害共生实践 灾害社会学 日本

中图分类号 | C912

作者信息 | 女,1954 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23。

日本乃世界著名多灾之邦,地震、海啸、台风、暴雨、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尤为频繁。置身于这种“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关于灾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灾害社会学渐次形成。本文拟从系谱、基本框架、重要概念、主要研究领域和实践取向等五个方面,对日本的灾害社会学做一概观。

一、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系谱

论及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前驱,一般会追溯到明治时期的地震灾害预防调查会和大正时期的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东京大轰炸和核爆炸受害者的调查也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页,而作为学术研究的灾害社会学研究的起

点,则是关于 1964 年新潟大地震时的恐慌行为及灾害信息问题的美日合作研究。参加这一研究的安倍北夫、冈部庆三和秋元律郎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界公认的第一代学者的代表。安倍的主要业绩在于通过对城市居民的灾害应急行为的系统分析,归纳出决定生死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成功逃生的应急行动模式。冈部以人际交往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推进了灾害信息和避难行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秋元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战后美国灾害社会学发展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2009 年度重大项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问题研究(2009JJD840012)”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行政管理项目(J504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阶段的归纳;二是把美国灾害社会学理论运用于日本的灾害案例研究,提出日本城市灾害的组织应对模式;三是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

就学者梯队而言,日本灾害社会学至今已有六代学者。^①以吉井博明和广井脩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在研究重点上,继承第一代学者的传统,继续致力于灾害信息研究;在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服务社会实践,开启了以“智囊团”身份参与重大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制定的先河。对日本来说,在灾害较少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第二代学者得以潜心反思和整理以前的调查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灾害社会学基本理论著作,如《都市災害の科学》(安倍北夫等,有斐阁,1982)、《都市と災害》(秋元律郎,至文堂,1982)、《災害報道と社会心理》(广井脩,中央经济社,1987)等。山本康正、浦野正树、广濑弘忠、田中淳、林春男、田中重好等一批年轻人在参加这些著作的资料整理和参与撰写的过程中,成长为第三代学者。大矢根淳、横田尚俊、中森广道、山下祐介、渥美公秀等第四代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生涯,到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灾时成为受灾地长期研究的中坚力量。在阪神·淡路大震灾时初涉灾害社会学研究的菅磨志保、越山健治、永松伸吾、関谷直也、浅野幸子等人,在之后接连发生的芸予地震、中越地震、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中积累起研究经验和成果,被称为第五代学者。而活跃于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研究第一线的一批新人,正在成长为第六代学者。

从研究本身来看,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步显著,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跨学科研究者增加、研究领域扩大、受灾地长期调查研究方法得以确立以及灾害共生对策成为核心主题。究其背景,以下两点十分重要。(1)新暴露的灾害问题促使更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投入灾害社会学研究,从而拓展了灾害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

1983年日本海中部地震引发的海啸,致使上百人丧生,这促使信息科学与灾害社会学联手致力于海啸警报迅速化问题研究;遇难者中有13名参加学校郊游的小学生,这使学校如何在突发灾害中保护学生生命的问题成为教育学与灾害社会学共同面对的新课题。沙林事件、东海村JCO临界事件以及美国“9·11”恐怖事件等重大人为灾害的发生,使危机管理成为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云仙普贤火山喷发、北海道西南冲地震及其引发的奥尻海啸、阪神·淡路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避难生活和复兴建设的长期化问题,使受灾地长期研究成为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而重大灾害的频繁发生以及关于东京圈直下型地震、南海·东海地震的预测,则使灾害共生实践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基本框架

以集合行动论、社会信息论、组织论和地域社会论为视角的研究,构成了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基本框架。^②

1. 集合行动论视角

在研究范式方面,集合行动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研究经历了由“崩溃论”到“创发论”的转换。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灾害时集合行动机制的主流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崩溃论”的范畴,以“致灾因子引起外部物理环境崩溃→社会系统崩溃→行为规范崩溃”为研究假设的基本模式。这种“崩溃论”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开始受到质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逐渐移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如何在灾害这一特殊

^① 此为大矢根淳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阐述的观点。

^② 参看〔日〕田中淳等著《集合行動の社会学》(北树出版,2003)和田中淳论文《災害と社会》(船津卫等《21世紀の社会学》,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

背景下得以重构或创新的问题,“创发论”的影响力随之渐次增强。

在研究对象方面,集合行动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的关注重点也有明显变化。恐慌行为曾经备受关注,但大量案例研究表明,灾害时很少发生恐慌行为,未能成功逃生的原因大多在于未能及时采取恰当的避难行动。于是,研究重点就从如何避免恐慌行为转移到如何推进避难行动。此外,随着上述研究范式的转型,救灾志愿者、救灾组织以及社区的活动也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2. 社会信息论视角

若能及时得到准确的灾害信息,人们就会采取适当的避难行动——这一假设是社会信息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的出发点。这一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灾害信息本身的研究(如分类及体系构成、内容及表述形式等);二是关于灾害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的研究(如各类媒体灾害信息报道的特点及互补、发布过程等);三是关于灾害信息的处理和接收的研究(如灾害信息及其报道的负功能、灾害信息处理体制、灾害信息共享系统、救灾组织间的信息沟通等);四是关于灾害文化和防灾教育的研究。

3. 组织论视角

E. L. 库朗特利和 R. R. 达尹竺领导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灾害研究中心曾提出一个关于救灾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分类的分析框架,以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内容为两根轴线,根据灾害发生前后有无变化对组织进行分类,并对各类组织的特性和功能进行实证分析。秋元律郎和山本康正将这一分析框架引入日本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而在他们及其后辈研究者的研究实践中又有许多独创性的发展。如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关于长崎暴雨灾害的调查研究和田野隆关于山体滑坡灾害的调查研究,在关于各级行政组织的职责及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阪神·淡路大震灾研究开启了创发型(emergence)救灾组织研究;还有学者把“自助”、“共助”和

“公助”的理念与组织理论相结合,对灾害相关组织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分析。

4. 地域社会论视角

在灾害社会学领域,普林斯(S. H. Prince)和索罗金(P. A. Sorokin)分别是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开创者,但两者都特别关注受灾地区灾后的长期社会变化。灾害不仅表现为致灾因子引发的瞬间物理性冲击,还表现为这种冲击导致的受灾地社会长期变化的整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以地域社会为对象的灾害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对于重大灾害频频发生、东海·南海大地震和东京圈直下型地震等巨大灾害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来说,地域社会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不仅关注灾害对受灾地区社会的长期影响,还关注漫长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地域文化对灾害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灾害从哪些方面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当地社会,这受制于该地区共有的地域文化。

三、日本灾害社会学的重要概念

1. 灾害

佛瑞茨(C. E. Fritz)、邦顿(A. H. Barton)、库朗特利(E. L. Quarantelli)等人把灾害看做一种社会系统因遭受突发的而且破坏性的冲击而偏离常态的现象。其中,邦顿明确地把致灾因子、物理性破坏及其引起的社会系统的变化看做灾害的三个基本要素,提出分析这种社会系统变化的四个角度:(1)以受灾地为中心的地理区分(直接受冲击区域、过渡区域、救援区域、外部区域)、(2)灾害的时间过程(社会准备期、预知·警告期、非组织性反应期、组织性应对期、复旧·复兴期)、(3)各种层面的社会单位(受灾者、组织、地域社会、国家及国民社会整体、国际社会)、(4)灾害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社会系统遭受的灾害、社会系统的灾害应对)。邦

顿的观点很早就被引进日本^①，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灾害认知的理论依据。

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灾害概念，也是研究者在长期研究实践中达到的灾害认知。在日本灾害社会学发展史上，岩崎信彦等人主编的三卷本《阪神・淡路大震災と社会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其中，“灾害”被如此定义：“对社会系统来说，灾害是一种突发事件。在物理空间轴上，受灾区域呈现为以受灾地为中心的同心圆。某个特定地理范围区域内的日常社会系统突然遭遇灾害，其影响会波及各个层面的各种社会单位；同时，对灾害的社会应对也表现为各个层面的各种社会单位在紧急应对、复旧、复兴等不同阶段的行动过程。”^②

2. 灾害共生论

人类关于灾害原因的认知最先是在“天灾论”层面，并经历了一个从敬畏超自然之“天”到求索自然规律的过程。这一点，日本民族自然也不例外。二战以后，随着上述基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灾害”概念以及“脆弱性”和“复元·恢复力”概念的引进，日本灾害社会学对灾害原因的认知从“天灾论”层面飞跃到“人祸论”层面。20世纪60～80年代，日本从多方面积极开展以防灾减灾为目的的国土建设，而此期间，日本没有发生一次死者超过千人的灾害，这使日本民众乐观地相信：人类可以消除灾害。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大灾害接踵而来，而日本又是国土面积狭窄的岛国，不可能把灾害频发地区都宣布为“不宜人居之地”，这一特殊环境孕育了一种新的灾害观：容纳灾害，与其共生。

对于上述灾害共生论，可从三方面把握。首先，其核心理念在于从肯定硬件承受力的有限性出发，思考社会如何把灾害的破坏力控制在最小程度，从而实现与灾害共生。换言之，灾害共生论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积极的灾害应对。其次，它强调每个居民、每个社会单位在防灾减灾

对策方面的责任，认为只有在每个人、每个社会单位都切实地承担起防灾减灾的责任时，“灾害共生”才可能从理想成为现实。再次，它是一种实践论，“灾害共生”是一个贯穿整个灾害过程的实践过程。以2000年有珠山火山喷发灾害为例，灾害共生实践表现为如下过程：火山喷发之前，进行各种防灾活动；火山喷发前夕，密切观察前兆的细微变化，及时发布紧急通告、避难劝告和避难指示，组织居民避难；火山喷发灾害发生时，因居民都已安全避难，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山喷发沉寂之后，展开以“与火山喷发共生”为目标的地区复兴和重建事业。

3. “脆弱性”和“复元·恢复力”

“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复元·恢复力”（resilience）这对概念并非同时产生，灾害社会学研究者首先发现的是“脆弱性”问题。B. 瓦茨奈把“脆弱性”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根源性·整体性要素，包括贫困、权力结构和资源限定、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等；二是动态压力要素，包括公共设施、教育、训练、适宜空间、投资环境、市场和新闻自由等的缺乏以及人口增加、城市化、环境恶化等宏观要素；三是危险的生活环境，包括脆弱的物理环境（如危险地区、危房、安全系数低下的城市基础设施等）和脆弱的地方经济（如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低收入等）。B. 瓦茨奈认为，由于上述要素的作用，人们的具体生活环境存在诸多脆弱点，当这些脆弱点遭遇地震、暴风、洪水、火山爆发、滑坡、饥饿、化学灾害等致灾因子，就会引起灾害的发生或扩大灾害造成的损失。

“复元·恢复力”的本意指“回跳”和“反弹”或“伸缩性”，作为学术概念，它首先进入力学领域，指材料会因受力而发生形变但具备恢复势能的能力；1970年代，它被引进生

^① A. H. 邦顿《災害の行動科学》，安倍北夫监译，学阳书房，1974。

^② （日）岩崎信彦等编《阪神・淡路大震災と社会学》第3卷，昭和堂，1999，第323页。

态学领域,先只是指生态系统的一种自我恢复能力,后被用来说明“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后,它被作为“脆弱性”概念的补充,指社会系统对致灾因子冲击的承受力和恢复力。在灾害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复元·恢复力’概念是一个帮助人们在把握宏观环境的同时,聚焦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交往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要素的逻辑装置”。“复元·恢复力”研究的根本目的有二:发现内在于受灾地区社会文化结构深处的、真正能够帮助受灾地社会从灾害中恢复元气的原动力;从社会系统内部着手,提升其对致灾因子冲击的承受力和恢复力。^①和欧美国家的灾害社会学一样,在日本灾害社会学界,“脆弱性”研究比“复元·恢复力”研究起步更早,成果更丰硕。而随着“灾害共生”理念的确立,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更加重视“复元·恢复力”问题。

四、日本灾害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1. 灾害中的生命和心理问题

灾时应急反应和逃生行动、医疗急救及其体制、灾害与生死、受灾者心理援助、救援者心理援助、救灾相关组织等问题,都是这个领域的研究重点。

2. 灾害信息

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灾害信息与行动”(灾害信息对避难行动和防灾行动的影响等)、“灾害信息与媒体”(各类媒体在灾害信息传播方面的特点、互补以及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途径等)、“灾害信息发布过程”(灾害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迅速性、灾害信息的准确性、灾害信息的详细化和细分化、灾害信息的表述等)以及“灾害文化和防灾教育”。

3. 灾后生活

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课题有“灾害弱者问题”、“避难生活”、“受灾者的生活重建”和“受灾地区的复兴建设”等。

在日本,“灾害弱者”这个概念最早出现

在1986年的《防灾白皮书》中,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灾之后,“灾害弱者”问题成为灾害社会学的一个关注重点。^②“灾害弱者”,也即“灾害时需要援助者”,指那些在灾害发生时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回避危险或逃避到安全之处,在灾害发生后也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在避难所生活以及进行复旧复兴工作,因而在整个灾害期间都必须依靠他人援助的人。^③具体包括“老年人、需要护理者、身心障碍者、重病患者、孕妇、未满五岁的孩子、不能熟练使用日语的外国人等”。^④日本灾害社会学关于灾害弱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灾时灾害弱者的逃生困难、灾后灾害弱者的生活重建困难、灾害弱者的社会责任、解决灾害弱者问题的具体措施等方面,其研究成果直接促成日本政府的《对灾害时需要援助者提供避难援助的指导意见》和日本红十字会的《灾害时需要援助者对策纲领》的出台。

在日本灾害社会学中,“避难生活”主要指受灾者在避难所的生活,其研究重点包括避难所的生活问题、运营问题以及对“灾害时需要援助者”的照护问题。关于避难所的生活问题,松田丰等人按照时间过程把它划分为灾后最初阶段的“生活功能”问题、稍后的“生活环境”以及再后的“生活重建”问题。^⑤关于避难所的运营问题,岩崎信彦等人根据避难所运营主体把它分成五类。^⑥而

① (日)浦野正树等《復興コミュニティ入門 復興》弘文堂 2007 第 32 页。

② (日)大矢根淳等《災害社会学入門》,弘文堂 2007 第 136 页。

③ (日)日本红十字会《災害時要援助者対策ガイドライン》2006。

④ 《朝日新聞》朝刊 2011 年 4 月 13 日。

⑤ (日)松井丰等:《あのとき避難場所は——阪神・淡路大震災のリーダーたち》,ブレーン出版 1998。

⑥ (日)岩崎信彦等《避難所運営の仕組みと問題点》,神戸大学震災研究会编《大震災 100 日の軌跡》,1995。

避难所对“灾害时需要援助者”的照护问题，也是上述“灾害弱者”研究的一部分。

在灾后复兴研究方面，阪神·淡路大震灾成为一个转折点。此前，灾后复兴一般以受灾地的空间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建筑物修建等为重点；此后，灾害社会学研究者明确地把受灾者生活重建问题与受灾地复兴建设问题区别开来，指出不仅受灾地的复兴并不一定意味着受灾者生活的重建，而且受灾地复兴建设有时还可能影响受灾者生活重建。他们关于受灾者生活重建的研究，推进了“受灾者生活重建援助法”的制定。在受灾地复兴建设方面，街区和居民共同体的恢复和新建，即社区复兴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4. 新视点

近年来，以下四个方面受到较多关注，将成为新的重要研究领域。^① 一是防灾福利社区研究。在现代城市里，基层地域社会应对巨大而复杂灾害的能力愈趋低下，脆弱性日渐增强；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的愈加加剧，基层地域社会面临如何维持和发展老年社会福利的难题。“防灾福利社区”是一种把这两者整合为一个社会问题加以考虑的新思路，试图通过重新开发传统社会中的“居民互助”这一福利资源，并把它整合进现代社会结构，从而构建社区这种现代居民共同体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防災福祉コミュニティ—地域福祉と自主防災の結合》（倉田和四生，ミネルヴァ書院，1999）、《共同性の地域社会学》（田中重好，ハーベスト社，2006）等。

二是灾害与社会性别问题研究。在女性在避难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在防灾救灾中的积极作用以及男女共同参与灾害共生对策制定与地域社会“复元·恢复力”的内在联系等方面，近年已有研究成果问世。而大矢根淳认为，这一领域今后还将关注避难倾向、志愿者活动、避难所集体生活的影响、复兴过程中决策参与程度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以及灾害对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三是风险社会中的公民社会建设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志愿者活动及志愿者组织，包括救灾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平时多样化的志愿者活动及其防灾减灾功能等；二是居民互助网络及社区的构建。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震災ボランティアの社会学》（山下祐介等，ミネルヴァ書房，2002）、《ボランティアの知》（渥美公秀，大阪大学出版会，2002）、《震災ボランティア》（大阪ボランティア協会，1996）等。

四是受灾地长期调查方法研究。这是研究者在对自己的研究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这种方法进行理论化研究，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災害社会学の研究実践——“時空をこえた問題構造のアナロジー”を把握するフィールドワーク（比較例証法）》（大矢根淳，《専修社会学》第14期，2002）、《実践的研究のすすめ——人間科学のリアリティ》（小泉潤二等編，有斐閣，2007）等。

五、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实践取向

1. 灾害社会学的双重取向

按照长田攻一的分析，社会学的灾害研究以描述和揭示灾害引起的社会变动及其规律为重要目的之一，因而必然具有社会变动论取向；同时，随着社会系统的脆弱性、适应性以及复元·恢复力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学灾害研究的重点逐渐移向前灾害期社会系统的备灾状况，因而具有了防灾社会学的取向。他认为，因为具有社会变动论取向，所以社会学的灾害研究能够为已有社会学理论（如社会变动理论）提供研究素材；因为具有防灾社会学取向，所以社会学的灾害研究必然面向实践，直接服务于减少脆弱性、增强复元·恢复力的社会建设。^②

在长田之前，田中重好已经提出，可以把社会学的灾害研究区分为“以灾害为研究对

① （日）大矢根淳等，第211～263页。

② （日）岩崎信彦等编，第323～324页。

象的社会学”和“以灾害为研究素材的社会学”,前者为后者提供宝贵的研究素材,而后者则关注灾害的“非日常性”一面,发现那些在“日常状态”中隐藏很深而被忽视了的社会矛盾,从而修正和完善已有的社会学理论。^①

长田把自己的“社会学灾害研究双向取论”与田中的“社会学灾害研究两类论”相结合,首先把“以灾害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区分为“以说明灾害的社会机制为目的的‘灾

害社会学’”和“以战胜集合性灾害应急反应,并在实践中创建新的具有更高灾害免疫力的社会系统为目的的‘防灾社会学’”,其次把“以灾害为研究素材的社会学”区分为“以修正和完善已有理论为目的的‘理论性研究’”和“以解决以灾害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基层地域社会矛盾为目的的‘实践性研究’”,由此勾画出社会学灾害研究“四分法”的一般图式。^②

社会学灾害研究四分法

	理论化取向	实践性取向
以灾害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	灾害社会学	防灾社会学
以灾害为研究素材的社会学	相关社会学理论研究 (如地域社会理论研究、社会阶层理论研究、家庭社会学理论研究、族群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变动理论研究等)	实践社会学 (如街区建设、社会运动、社会规划等)

但是,对于以“脆弱性”和“复元·恢复力”为基本概念的灾害社会学来说,防灾研究是其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显然不能把防灾社会学从灾害社会学体系中分割出去。不过,长田和田中的分析确实揭示了灾害社会学的一般特性,即这是一门具有“理论化”和“实践性”双重取向的学问。

2. 日本灾害社会学向“实践性取向”的倾斜

在“理论化”和“实践性”的双重取向中,日本的灾害社会学明显地倾斜于“实践性取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就已有研究而言,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理论化取向”较为薄弱。首先,从数量来看,根据田中淳的统计,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关于自然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共有2087项,其中,防灾对策研究862项,灾害状况纪实462项,受灾状况调查329项,灾害过程理论研究287项(案例分析171项、基础研究116项)。由此不难推知,日本灾害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数量十分有限。其次,从内涵来看,在为数不多的基础理

论研究中,大多属于具体理论领域的研究,而很少有关于灾害社会学理论体系整体框架的研究;至于日本学者撰写的灾害社会学专著,也大多存在理论框架有欠完备、逻辑演绎有欠缜密的倾向。

关于造成上述“理论化取向”薄弱的主要原因,试举两点:(1)灾害社会学这一学科还十分年轻,而理论积累则是有待时日之事;(2)置身重大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度,日本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者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实地调查和对策研究,因而缺少缜密细致的理论思考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所需要的时间。

其二,就基本理念而言,日本的灾害社会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取向”。这一“实践性取向”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明确地以灾害共生实践研究为出发点和归宿;二是研究项目绝大多数为应用性研究;三是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各项相

^① (日)岩崎信彦等编,第334页。

^② 同上,第325页。

关实践活动;四是受灾地长期调查的研究方法受到普遍重视;五是作为研究成果的实证资料浩瀚、真实、完整。正是这种鲜明的“实践性取向”使日本灾害社会学成为世界灾害社会学体系中的一枝奇葩,尽管“理论化取向”较为薄弱,但总体水平仍位居前列,为其他国家的灾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自20世纪末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理论化取向”薄弱这一问题,并明确提出日本灾害社会学应该处理好“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关系”,^①把构建关于灾害共生实践的学术体系作为重要课题。^②随着人类遭遇极端天气和灾害成为一种常态,可以预见日本灾害社会学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意义会愈加显现。

参考文献:

1. A. H. 邦顿《災害の行動科学》,安倍北夫监译,学阳书房,1974。

2. (日)野田隆《災害と社会システム》,恒星社厚生閣,1997。
3. (日)岩崎信彦等编《阪神・淡路大震災と社会学》,第3卷,昭和堂,1999。
4. (日)倉田和四生《防災福祉コミュニティ地域福祉と自主防災の結合》,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
5. 東京ボランティア・市民活動センター:《市民主体の危機管理》,简井書房,2000。
6. (日)山下祐介等《震災ボランティアの社会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02。
7. (日)渥美公秀:《ボランティアの知》,大阪大学出版会,2002。
8. (日)田中重好《共同性の地域社会学》,ハーベスト社,2006。
9. (日)大矢根淳等《災害社会学入門》,弘文堂,2007。
10. (日)浦野正树等《復興コミュニティ入門》,弘文堂,2007。

(责任编辑:贺慧玲)